



兔年春节,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满江红》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。随着电影热映,人们对宋代抗金名将岳飞以及词作《满江红》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。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……”重读熟悉的词作,重温那段历史,字里行间或许能读出不一样的味道。

□丁辉

中国是一个伦理化的国度,政治上的雄图亦常常迂回地以道德为号召、为凝聚。所以,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皆宣称“以孝治天下”;所以,刘邦进了咸阳之后,“财货无所取,妇女无所近”,摇身一变,俨然成了正人君子,范增一下子就看出“此其志不在小”,奈何项羽不懂这个道理。反之,道德上的污名化,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示人以“无他志”“无异志”,从而得以远害全身的不二法门。

以此理逆推,诸多历史之谜或可迎刃而解,比如:岳飞为什么“必须”死?他太干净了,而已。

南宋中兴四大名将里,刘光世的资历最老,却贪生怕死,贪财好色,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中评价他说:“光世在当时贪财好色,无与为比,军政极是弛坏。”此人虽与金人有杀父之仇,却每与金人战,一触即溃。张俊打起仗来本事不大,聚敛财富却有一手,他大肆兼并土地,号称“占田遍天下,而家积巨万”。绍兴二十一年(公元1151年)十月,张府招待宋高宗赵构一顿家宴,那张极尽奢华的菜单是中国烹饪史上的重要文献。韩世忠倒是能打仗,但好色成性,除自己妻妾成群外,部将妻女稍有姿色者,多难逃其手。只有岳飞,不怕死,能打仗,又不爱钱,不好色。

一个过于爱惜、经营自己的声誉而又手握重兵的人,在官家(宋代称皇帝为“官家”)眼中是最危险的。海瑞曾评张居正“工于谋国,拙于谋身”。张居正身前尽享威福,身后起初也备极哀荣。皇帝翻脸,夺爵、抄家,长子张敬修自杀,余子充军,已经是居正死后一年的事情了。就算张居正“拙于谋身”,他也不是拙于谋自己之“身”,而是拙于谋后世子孙之“身”。真正当得起“工于谋国,拙于谋身”的,恐怕就是岳武穆了。

对武人的猜忌与防备,是赵宋皇室的政治基因。自太祖赵匡胤起,便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。国族之间有争端,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,所谓花钱买和平,也不欲多劳动刀兵,以防武人借机做大。在这种既定的权力结构里,一

【史海钩沉】

岳飞为什么『必须』死

个手握重兵的武人,已足以影响官家的睡眠质量;如果这个武人更兼以道德上无可挑剔,官家不起杀心,他简直就不姓赵了。

更何况岳飞这人还颇“骄横”。和岳飞差不多同时期的朱熹与叶水心对此都有过评论。我想这所谓的“骄横”也是需要底气的。这底气主要不在功高,而在其道德上的“无瑕”“无私”。无私是优点,惟因无私而无畏,什么都想说,敢说,认为自己不管说了什么,官家都会以“一秉忠心”而加优容,那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了。绍兴七年,岳飞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,奏请皇帝建储。官家无子嗣,建储就意味着要把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山拱手他人,何况,官家春秋正盛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自己的子嗣。要知道,五代冯道之所以能历四朝十一主而不倒,“不预废立”是一个重要的窍门。对于岳飞的奏请,官家的回答是:“卿言虽忠,然握重兵于外,此事非卿所当预也。”你听到官家“玉音”背后的杀伐之声了吗?

说到底,岳飞这样的人还是“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”。他自以为是清廉无私、直道而行的忠臣,然而,专制君主的心事之幽深莫测是岳飞所可梦见!在官家眼中,臣子的“忠诚度”和臣子的道德修为并非是正相关,且毋宁是反之,劣迹昭彰的张俊之流才是可以让自己放心的“忠臣”。如同晚清岑春煊、瞿鸿禨反腐败,欲扳倒庆亲王奕劻,最后之所以失败,亦是因为岑春煊之流亦“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”。岑春煊说庆王是贪官,所以是奸臣;而在慈禧眼中,庆王正是以其“贪”而让慈禧不疑其“忠”。贪不仅不可恨,反是庆王之所以独蒙“帘眷”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说不定。

在中国古代险恶的政治生态里,“醇酒妇人”可以远害全身,直道而行则难免自蹈死地。绍兴十一年(公元1141年)小年夜,岳飞被以“谋逆”的莫须有罪名赐死,其子岳云、部将张宪皆斩于市。

明人洪应明《菜根谭》有言:“完名美节,不宜独任,分些与人,可以远害全身;辱行污名,不宜全推,引些归己,可以韬光养德。”说的似乎是日常的处世之道,却分明让我们照见中国历史的阴森之影。

□戴永夏

立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,它标志着冬天结束和春天到来。因为这一天是四季的开端,春气开始降临,所以称为“立春”。

立春跟农事密切相关,因而它的许多节俗活动都带有鲜明的农耕色彩。这些节俗主要有迎春、鞭春、咬春等,先民们就是通过这些活动庆祝春天到来,劝励农耕,祈求丰收。

早在周代就有了立春这天迎春的风俗。据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:“立春之日,天子亲率三公九卿,诸侯大夫,以迎春于东郊。”《汉书·郊祀志》也记载:“迎春于东郊,祭青帝、勾芒,百官衣皆青。郡国县官,下至令史,服青帻。”立春这天,天子要率领文武百官,举行隆重仪式,到京城东郊迎接并祭祀青帝和勾芒这两位司春之神。明清以后,各地“迎春”之礼演变为“报春”之俗:立春这天,地方长官专门组织穿青衣的队伍游行于街,并设坛亲自主持报春仪式。仪式开始先祭祀神灵,然后接受身穿彩服的报子“报春”。报子一报“风调雨顺”,二报“五谷丰登”,三报“国泰民安”。每报一次,周围群众便齐声呼应。

在民间,更为普遍的迎春形式是戴春幡和贴宜春帖。春幡又叫“春胜”“幡胜”,是用绢、纸、布制成的青色小旗,立春日戴在头上,以示迎春。据宋代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宋代皇帝在立春日接受百官朝贺时,还把金银做的幡胜赐给官员簪戴。后来,人们对春幡又做了进一步改进,除小旗外,增加了鸡、燕、蝴蝶、花朵等造型,颜色也由单一的青色变为五颜六色。人们把这些美丽的饰物戴在头上,象征着五彩斑斓的春天的到来。

除了春胜这种戴在头上的饰物外,立春日还有贴在门上的迎春饰物,叫“宜春帖”,又叫“宜春”,即写着祝颂新春词语的长方形纸片,类似春联。戴春幡和贴宜春帖的风俗,在南北朝时就已经盛行,南朝梁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载:“立春之日,悉剪彩为燕以戴之,贴‘宜春’二字。”至宋代,连皇官内也流行贴宜春帖。每逢立春前夕,一些御用文人就忙着为内廷写立春的帖子,正如王曾《皇帝阁立春帖子》诗中所写:“北陆凝阴尽,千门淑气新。年年金殿里,实字贴宜春。”

立春日的一项重要习俗是鞭春。所谓鞭春,就是将泥塑或纸糊的春牛以杖击碎,象征春耕开始,催牛耕地。鞭春的仪式盛行于唐、宋两代,尤其是宋仁宗颁布《土牛经》后,鞭春习俗传播更广。每到立春前夕,各府、州、县将造好的土牛、芒神迎到城门口,

【民俗漫谈】

立春之日的鞭春与咬春

官衙前等人群聚集的场所。立春这天一大早,官员们来到放置春牛的地方,用五色丝编织的“春杖”(即鞭子)依次击打土牛三下,称为“打春”,寓意让春牛勤于耕种,换来丰收。土牛打碎后,围观者一拥而上,争抢碎土,谓之“抢春”。据说抢得牛头土,大吉大利;抢得牛身土,养蚕兴旺;抢得牛角上的土,庄稼丰收。

自明清以来,鞭春活动更加丰富多彩。官府用彩纸扎成春牛,并在牛腹中放上栗子、红枣等干果及五谷杂粮。仪式开始时,由八个或十六个身穿青衣的小伙抬着春牛,后面跟着舞狮、踩高跷、扭秧歌的队伍。立春时刻一到,鞭炮齐鸣,锣鼓喧天,表演队伍载歌载舞,州县官员手持“春杖”,将春牛的腹部打破,腹中的干果、粮食撒了一地。这时围观的群众一拥而上,争抢地上散落的粮、果。把捡到的五谷带回家放在自家的粮囤里,据说能使五谷丰登、丰衣足食。

鞭打春牛时,州县官员还要边打边唱:“一打风调雨顺,二打地肥土暄,三打三阳开泰,四打四季平安,五打五谷丰登,六打六合同春,七打七星高照,八打八方吉祥,九打九州太平,十打十全十美……”

立春日,全国各地还有食生菜或将多种生菜、果品、饼、糖等堆放在盘中食用的习俗,谓之“咬春”。放这些食品的盘叫“春盘”,盘中的薄饼叫“春饼”。咬春之意,是要把春色咬住,不让它悄悄溜走,可见人们对春天是何等珍爱。

咬春之俗历史悠久,汉代就有“立春日食生菜”的记载。至于立春食春盘的习俗,则源于北朝大臣李暹。某年立春,李暹命家人将萝卜、芹菜等生菜堆放在盘中,馈送亲友。以后江淮一带的人竞相仿效,遂演变成俗。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中就有“立春之日……啖春饼、生菜”的记载。至唐宋,立春食春盘之风更盛,宋代此俗还由民间扩展至宫廷,皇帝在立春这天,以春酒、春盘赐

予百官近臣。据宋人陈元靓的《岁时广记》记载:“立春前一日,大内出春盘并酒,以赐近臣……”至明清,春盘的做法更复杂,菜品更丰富,人们对咬春也更加重视。如在旧时的北京,立春日吃春盘,春饼被视为生活中的大事。清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就记载说:“新春献辛盘(即春盘)。虽士庶之家,亦必割鸡豚,炊面饼,而杂以生菜,青韭芽、羊角葱,冲和合菜皮,兼生食水红萝卜,名曰‘咬春’。”这种在立春日食春盘、春饼的习俗,一直延续到现代。每到立春这天,老北京人都要用生萝卜、白菜心、鲜黄瓜、黄芽韭等做成春盘,再用白面做成薄饼,放在平底锅上烙成春饼。在饼上抹面酱,再卷上春盘中的生菜,便可有滋有味地品尝春的味道了。俗信立春日食春盘、春饼,可以解春困、避牙疾。吃过春盘、春饼,表示严冬已去,万紫千红的春天就要来了。

